

#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 ——来自中国 8 省（区）16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证据

张 晨<sup>1,3</sup> 马 彪<sup>2</sup> 仇焕广<sup>3</sup>

**摘要：**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的社交距离具有重要影响，而社交距离又是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 2019 年中国 8 省（区）16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安置方式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分散安置，集中安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其影响集中体现在搬迁户公共事务参与频率减少和在迁入地与原居民和睦相处程度降低两个方面。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集中安置增加了搬迁户的社交距离，表现为搬迁户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的降低对社会融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后续扶持政策应该重点关注搬迁户与原居民如何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关系这一核心议题，以期为搬迁户在迁入地营造公平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和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发展。

**关键词：**安置方式 移民搬迁 社交距离 社会融入 机制分析

**中图分类号：**F310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脱贫攻坚不仅是党中央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重要节点保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的标志性工程，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截至 2020 年底，960 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乔迁新居并实现脱贫。然而，绝对贫困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彻底被解决，完成搬迁只是易地扶贫搬迁的基础，能否顺利实现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才是决定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2018 年召开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就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平稳、有效地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新贫困发生，将是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在后扶贫时代以及“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编号: 71861147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农业农村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框架与行动逻辑: 兼顾多目标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编号: 72141307)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通讯作者: 仇焕广。

易地扶贫搬迁属于大型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学术界也受到广泛关注。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学者大多围绕社会融入过程分析和相关理论解释、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以及社会融入测度等主题开展研究。在社会融入过程分析和相关理论解释方面，Gordon（1964）为主提出的传统社会融入理论是现阶段社会融入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强调搬迁户与原居民之间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的过程，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与原居民达到在迁入地相互适应并融合的结果，并将社会融入定义为文化、结构、婚姻、认同、态度、行为和市民7个方面的融入。除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外，部分融入理论（Portes and Zhou, 1993）和新融入论（Alba and Nee, 2009）是近些年较被认可的理论，分别用以解释第二代搬迁户和不同社会层级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在社会融入影响因素方面，主要包括人力资本（Chiswick, 2009）、社会资本（Fordham, 1996）和移民搬迁特点（冯晓英, 2013）等。人力资本作为社会融入的驱动力主要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原有的人力资本，即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等（Yamauchi, 2004）；其二是新积累的人力资本，如参加培训或工作经验积累等（Duleep and Regets, 1999）。移民搬迁发生后搬迁户原有的社会资本在迁入地基本处于失灵状态（冯伟林等, 2016），而在迁入地新积累的社会资本得经过一定时期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在社会融入测度方面，社会融入是一个抽象、涵盖宽泛、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的概念，在研究不同具体问题时关于社会融入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多涉及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等层面（周皓, 2012），部分文献在关注社会互动层面的融入时，往往侧重于考察社区、文化方面的融入（Danzer and Yaman, 2013）。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西方文献在分析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问题时，社会融入定义所包含的某些特征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并不适用。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户与原居民往往不存在文化差异，易地扶贫搬迁的原则是在本行政村、本乡镇、本县内就近安置，搬迁户与原居民的风俗文化差异不大。另一方面，西方文献多侧重于考察多时段的分散移民，并且他们大多是主动移民，社会融入具有较强的内生性问题。而易地扶贫搬迁是政府主导、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大规模搬迁，包括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等安置方式，搬迁行为是相对外生的。

为验证集中安置是否会阻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并探讨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可能的影响，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集中安置是否会阻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第二，如果会阻碍，那么，集中安置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三，安置方式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脱贫攻坚战胜利后，扶贫工作重心将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站在新的历史时点分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厘清上述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探究不同安置方式下搬迁户社会融入差异化现象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政策可能需要做出的调整提供思路。

## 二、逻辑框架和理论分析

集中安置是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的主要安置方式，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总体布局，集中安置人口占移民搬迁总人口的76.4%。集中安置包括行政村内就近安置、建设移民新村

安置、小城镇或工业园区安置、乡村旅游区安置等模式，其目的是依托安置区附近的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为搬迁户营造环境宜居、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是易地扶贫搬迁涉及人口数量最多、安置区建设力度最大、投资布局最完善的安置方式。如何使集中安置户在迁入地顺利实现社会融入是易地扶贫搬迁后期重点关注的重要内容。

但是，集中安置户是带有政策标签的迁入地“新来者”，安置点存在明显的地理边界，会导致搬迁户与原居民彼此割裂开来：长期的空间隔离与缺乏接触，往往会导致偏见、矛盾与冲突的出现。比如，迁入地贫困边缘户出于政策原因无法享受精准扶贫政策，也无法享受易地扶贫搬迁对应的后续扶持政策，其家庭收入包括家庭其他基本状况却与易地扶贫搬迁户接近，因而易产生心理不平衡，进而转化为对集中安置户的偏见。又如，与搬迁户在社会资源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的原居民群体，因集中安置户挤占公共资源、劳动力市场而对集中安置户产生排挤，甚至引发冲突。再如，由于搬迁户普遍来自农村，在一段时期内往往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化的物业管理方式，难免在生活习惯上与原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引发生活矛盾。

搬迁户在面对以上偏见与歧视时，往往会出现与迁入地原居民社交距离不断拉大的现象（Gould, 1999）。这种情况下，搬迁户在面对冲突、对抗、未知风险时会在内部自发形成利益团体，团体内部共享资源、信息，并与团体外的群体产生隔离，极大地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通常来说，由于文化、习惯、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在进入新环境开启社会生活时，搬迁户经常遭受来自迁入地原居民的疏远，即使这种疏远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也容易导致搬迁户与迁入地原居民产生隔阂（Portes and Sensenbrenner, 1993）。这无疑会影响迁入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且阻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进程。

已有文献已经注意到搬迁户搬迁至迁入地后与迁入地原居民存在隔阂（Perez, 1986）及较低的社会融入现象（Gold, 1988; Foment, 1989），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具体来说，主要原因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源于搬迁户内部的抱团取暖。按照传统社会融入理论，搬迁户内部出现抱团取暖的原因可归结于文化差异（Anthias, 2007）。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导致搬迁户与原居民空间上的长期隔离，为了在迁入地更好地生存，搬迁户在群体内部主动形成可以获取资源的社会网络（Fernández and Ortega, 2008）。其二是源于迁入地的排挤与偏见（Nee and De Bary, 1973）。搬迁户往往会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而且搬迁户与原居民在公共资源利用方面存在冲突（Boswell, 1986）。而以上两点，与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安置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以集中安置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往往需要配套大型的安置社区，安置社区明确的边界带来的地理环境的隔离是集中安置户与迁入地原居民社交互动的天然障碍。另一方面，虽然分散安置户与迁入地原居民没有明确的地理隔离，但是，分散安置户带有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贫困政策标签”会使其遭受迁入地原居民（尤其是在迁入地处于贫困边缘却无法享受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扶持政策的边缘户和返贫风险较高的居民）的偏见、远离甚至排挤。这都不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可以发现，地理空间隔离、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降低是造成搬迁户社会融入不顺利的主要原因，而易地扶贫搬迁以集中安置为主的安置方式恰恰增加了以上不利因素产生影响的概率。但是，无论是现有文献还是地方政府在后续扶持政策方面都未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进行清晰的推断。归根

结底，低效率的社会融入从本质上讲属于搬迁户与原居民群体社会互动不足的表现（Marger, 2001），而社交距离会影响社会互动（Buchan et al., 2006）。

至此，本文引入社交距离这一概念，用以分析安置方式与社会融入间因果关系的内在机制。社交距离是分析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Akerlof, 1997），社交距离对于个体社会经济行为决策（Hoffman et al., 1996）、不同种族的同化过程（Qian and Lichter, 2007）、搬迁户在迁入地的不平等问题（陈云松和张翼, 2015）等均具有重要影响。社会融入是反映搬迁户在迁入地生活适应状况的重要变量，社交距离对于搬迁户融入迁入地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涉及居住社区内不同群体地理分布的问题时（Massey and Mullan, 1984）。

易地扶贫搬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这两种安置模式在搬迁户与原居民的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集中安置往往单独建有安置社区，而分散安置模式下搬迁户则插花分布于原居民社区内部。安置方式不同，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社交距离也不同，而社交距离又是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通过社交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分析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同时，本文参考 Pagnini and Morgan（1990）的做法，将社交距离分为物理距离、心理信任与公平感知3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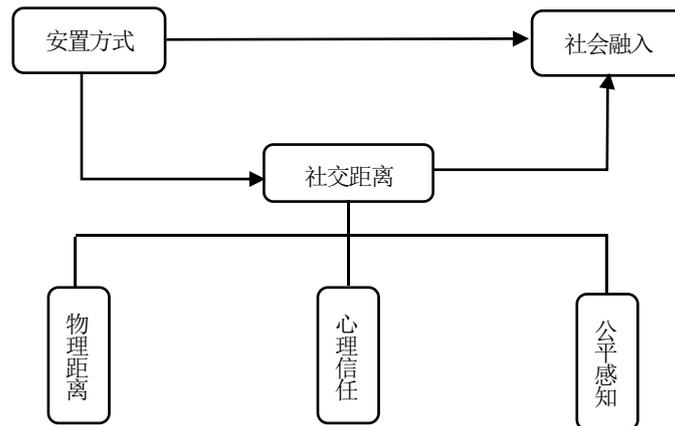


图1 安置方式影响社会融入的分析框架

###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追踪调查数据，课题组从2016年6—7月开始基期调查，分别于2017年7月、2019年5月进行2期追踪调查，其中，2016年的基期调查样本共包括2185户贫困户。本文使用的样本来自2019年的调查，原因在于2016年贫困户均未搬迁，2017年已累计完成搬迁的贫困户数量（510户）较少，2019年已累计完成搬迁的贫困户数量（1231户）较多，且截至2019年累计完成搬迁的贫困户搬迁时间较长，可以较好地反映其社会融入状况。因此，本文使用2019年的截面数据，将这1231户已搬迁户作为研究样本。

课题组按照《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总体布局，在充分

考虑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地理区域分布、政策区域分布、安置模式和搬迁模式等因素的前提下，最终选取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 8 省（区）作为样本省份。选择这 8 省（区）展开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各样本省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总人口均超过 50 万人，不仅是《规划》中搬迁规模排在前 8 位的省份，也是《规划》中涉及的搬迁户所在的主要区域，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基本特征。第二，样本区域不仅覆盖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还包括 1 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区域，样本区域正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大力实施的区域。第三，从安置模式来看，《规划》中“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模式，其中，集中安置 1244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76.4%，分散安置 384 万人，占搬迁总人口的 23.6%。本文研究的 8 省（区）涵盖的集中安置人口占比为 75.5%，与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情况接近，为本文研究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设置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综上所述，样本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样本省份范围确定后，课题组基于搬迁户地理分布、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区域以及搬迁规模等因素，在每个省份选择 2 个样本县，并最终确定包括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这五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内的 15 个样本县，以及 1 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共 16 个样本县作为研究区域，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搬迁户样本。具体抽样规则如下：在充分考虑搬迁户和搬迁计划的基础上，在每个样本县选取 2~3 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都随机选择 3 个行政村，随后在每个村随机抽取 1~2 个村民小组，在每个小组随机抽取 8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户。此外，为了保证样本的均衡，每个县的样本规模需要至少满足 1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户的基本要求。

## （二）社会融入测度

社会融入指搬迁户在经济、社区、文化、心理、身份层面适应迁入地社会的过程（Berry, 1997；杨菊华, 2009），由于迁出地和迁入地通常在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搬迁户为适应迁入地生活，通过与原居民之间持续的接触，会主动地朝迁入地社会主流水平接近（Gordon, 1964；Portes and Zhou, 1993）。对于多维度的概念很难用单一指标做出清晰的解释，因此在衡量社会融入程度时往往使用多个指标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研究主题下，社会融入指标的选取往往也有不同，既有多维度的综合指标，也有衡量具体行为的单一指标。本文较为关注的是安置方式对于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因此选择社区和文化层面的融入作为社会融入的表征。这是因为搬迁户和原居民的社会互动中与安置方式相关的更多的是社区和文化层面的社会互动，这种社区和文化层面的互动也能更具体地反映安置方式带来的社会融入变化。本文从社区、文化互动的角度测度社会融入程度，具体的衡量指标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社会融入测度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指标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程度	公共事务参与 ( $b_1$ )	在迁入地参加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频率（不参加=1，偶尔参加=2，经常参加=3）	2.247	0.814
	原居民互动 ( $b_2$ )	在迁入地与原居民的接触频率（非常少=1，很少=2，一般	2.756	0.977

		=3, 很多=4, 非常多=5)		
	和睦相处 ( $b_3$ )	在迁入地是否与原居民和睦相处 (是=1, 否=0)	0.671	0.470
	文化娱乐活动 ( $b_4$ )	在迁入地文化娱乐活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单位: %)	3.879	10.340

社区是搬迁户在迁入地生存的核心场域,为搬迁户的“和平感”和心理归属提供了空间和地理层面的基础,同时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文化接触、渗透提供了持续的契机,社区与文化融入是整个社会融入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互动之一(Fitzpatrick, 1966)。社会融入的基本前提是搬迁户对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决策有参与感(Cheong et al., 2007),这也是反映搬迁户在迁入地基本权利的有效指标。此外,在迁入地与原居民的接触有利于搬迁户实现社会融入(Facchini et al., 2015),与原居民长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也是搬迁户在迁入地实现稳定、长期发展的关键。迁入地原居民对搬迁户的歧视与偏见,会造成社区内双方产生矛盾甚至冲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搬迁户长期的社会融入(Esses et al., 1998)。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是以本县内就近安置为主的搬迁工程,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等差异较小,因此,搬迁户在文化融入方面障碍较小,文化互动更多体现为搬迁后文化娱乐活动变化带来的家庭福利变动(Shaul and Gramann, 1998),且社会融入程度较高的家庭普遍更倾向于进行更多文化娱乐活动。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其休闲娱乐活动行为也必然发生改变,这为观测和分析社会融入中文化互动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张晨等, 2022)。因此,本文使用搬迁户在迁入地的公共事务参与、与原居民的互动、是否与原居民和睦相处和在迁入地文化娱乐活动支出占比来测度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

在确定社会融入的测度指标后,本文使用熵值法根据指标变异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利用此方法计算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可以避免主观人为因素引致的权重设定偏误,提高综合指标评价的合理性。具体来说,指标体系中某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即信息熵越小,进而指标的权重就越大;相反,某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意味着不确定性越大,即信息熵越大,进而指标的权重就越小。

构建数值型矩阵  $Y = (y_{ij})_{mn}$ , 由于本文中的指标均是正向指标,对矩阵  $Y$  中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并得到数值型矩阵  $B = (b_{ij})_{mn}$ , 其中,标准化后的数值  $b_{ij}$  为:

$$b_{ij} = \frac{y_{ij} - y_{j\min}}{y_{j\max} - y_{j\min}}, \quad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1)$$

矩阵  $B = (b_{ij})_{mn}$  中,第  $j$  项指标的熵权值为:

$$L_j = -\frac{1}{\ln m} \sum_{i=1}^m x_{ij} \ln x_{ij}, \quad j = 1, 2, \dots, n (0 \leq L_j \leq 1) \quad (2)$$

(2)式中,  $x_{ij}$  是第  $i$  个样本第  $j$  项指标值占该指标值总和的比重,即  $x_{ij} = b_{ij} / \sum_{i=1}^m b_{ij}$ 。若  $x_{ij} = 0$ , 则需要修正,因为此时  $\ln x_{ij}$  无意义。

最后，利用熵权值  $L_j$  计算出指标  $j$  的权重：

$$w_j = \frac{1 - L_j}{n - \sum_{j=1}^n L_j} \quad (3)$$

###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了分析安置方式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SI_i = \beta_0 + \beta_1 R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4)$$

(4) 式中， $SI_i$  表示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使用熵值法对表 1 中衡量社会融入程度的 4 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然后使用功效系数法标准化为取值范围在 0~100 的得分，最终得到社会融入程度  $SI_i$ 。核心解释变量  $R_i$  为安置方式，对于集中安置， $R_i = 1$ ，对于分散安置， $R_i = 0$ 。 $X_i$  为控制变量。本文尽可能多地控制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如受访者个人特征（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稳定性、社会资本等）、家庭特征以及家庭成员收入和消费情况等。 $\varepsilon_i$  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为了分析安置方式对社会融入 4 个方面程度测度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影响并加以比较，本文进一步使用似不相关回归 (seeming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进行分析。似不相关回归可通过对 4 个社会融入指标回归方程的联合估计，解决不同回归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可能相关的问题，从而提高估计效率并方便比较不同回归方程估计得到的核心解释变量安置方式的回归系数。联合估计的方程组设定如下：

$$b_{1i} = \delta_0 + \delta_1 R_{1i} + \delta_2 X_{1i} + \varepsilon_{1i} \quad (5-1)$$

$$b_{2i} = \gamma_0 + \gamma_1 R_{2i} + \gamma_2 X_{2i} + \varepsilon_{2i} \quad (5-2)$$

$$b_{3i} = \eta_0 + \eta_1 R_{3i} + \eta_2 X_{3i} + \varepsilon_{3i} \quad (5-3)$$

$$b_{4i} = \mu_0 + \mu_1 R_{4i} + \mu_2 X_{4i} + \varepsilon_{4i} \quad (5-4)$$

联合估计的方程组中，(5-1)~(5-4) 式分别对应安置方式对社会融入测度指标体系中公共事务参与 ( $b_1$ )、原居民互动 ( $b_2$ )、和睦相处 ( $b_3$ ) 和文娱娱乐活动 ( $b_4$ ) 的回归方程。

本文回归分析使用的主要变量的具体界定及按安置方式分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集中安置户		分散安置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程度	受访者社会融入程度得分：0~100 分，分值越高，社会融入程度越高	26.684	16.939	30.040	18.192
控制变量	搬迁时间	搬迁到迁入地的时间（单位：月）	15.860	9.869	18.960	9.957
	年龄	受访者年龄（单位：岁）	54.457	12.285	55.548	11.723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性=1，女性=0	0.930	0.255	0.924	0.266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健康状况	受访者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康=0	0.627	0.484	0.588	0.493
	文化水平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单位：年）	5.156	3.414	5.033	3.119
	技术培训	受访者搬迁后接受技术培训的次数（单位：次）	1.132	2.899	1.581	3.254
	新建社会网络	受访者在迁入地新结识的亲戚朋友数量（单位：人）	31.246	49.332	37.900	66.725
	原有社会网络	受访者在迁出地原有的亲戚朋友数量（单位：人）	43.677	71.759	34.246	47.547
	婚姻	受访者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0.814	0.389	0.744	0.437
	工作合同	受访者是否签订正式工作合同：是=1，否=0	0.169	0.375	0.246	0.43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单位：人）	3.909	1.547	3.698	1.469
	子女数量	家庭子女数量（单位：人）	0.718	0.950	0.698	0.948
	民族	受访者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	0.345	0.476	0.199	0.400
	宗教信仰	受访者是否有宗教信仰：是=1，否=0	0.076	0.266	0.056	0.231
	人均纯收入	家庭成员人均纯收入（单位：元/年）的对数	8.384	0.981	8.490	0.891
	发展型消费	家庭成员人均发展型消费（交通、教育、通信消费，单位：元/年）的对数	6.466	1.051	6.348	1.162
中介变量	物理距离	与迁入地繁华集市的最短距离（单位：公里）	6.740	10.981	9.460	9.547
	心理信任	受访者对迁入地原居民的信任程度得分：0~10分，分值越高，信任程度越高	7.930	1.688	8.193	1.495
	公平感知	受访者自身在迁入地受到公平对待的感知程度得分：0~10分，分值越高，公平感知程度越高	4.856	1.865	5.017	2.061
工具变量	海拔高度	迁出村海拔高度（单位：米）	886.584	433.689	953.158	647.200
	安置人口数量	迁出村共搬迁出的户数（单位：户）	25.346	29.637	18.346	27.829
样本量			898		333	

从表 2 中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分散安置户的社会融入程度要高于集中安置户的社会融入程度，这为后文的实证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两类搬迁户在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家庭成员收入和消费情况等方面的差异较小，而在物理距离、心理信任、公平感知三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可初步从统计上说明安置方式会通过改变社交距离来影响社会融入。

####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一）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易地扶贫搬迁中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虽然安置方式是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的，但具体的安置方式可能受到迁出村地理位置、安置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遗漏变量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从而造成估计结果有偏。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在基准 OLS 回归的基

础上引入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处理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迁出村海拔高度和迁出村安置人口数量作为安置方式的两个工具变量。选择迁出村海拔高度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海拔高度是较好地反映地理位置情况的变量之一。迁出村海拔越高，搬迁户往往越可能来自山区，而居住在山区的住户往往较为分散且数量较少，集中安置的难度较大，集中安置的可能性较低。相反，海拔较低，则意味着搬迁户的原居住地可能更接近于经济状况相对优越的城镇，住户也较为集中，集中安置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海拔高度是可能影响安置方式的因素之一，这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此外，海拔高度作为反映地理位置情况的变量，属于较为外生的变量，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没有直接影响。

本文选取迁出村安置人口数量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安置人口数量是直接与安置方式的规划相关的，因为安置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所建安置区的规模大小，所以是安置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同时，迁出村安置人口数量对于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没有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安置人口数量同样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为了进一步证明所选取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本文对工具变量进行了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与统计量	检验结果
不可识别检验: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86.016 (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ragg-Donald Wald统计量	45.340
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统计量	1.221 (0.2691)
Hansen J统计量	1.100 (0.2943)

注：括号内为p值。

从表3中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结果来看，不可识别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本文选取的海拔高度和安置人口数量这两个工具变量符合秩条件成立的基本要求。弱工具变量检验中，Cragg-Donald Wald统计量为45.340，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8.68，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过度识别检验中，不同方差条件下Sargan统计量和Hansen J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0.1，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综上所述，海拔高度和安置人口数量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了各项有效性检验，证明了其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4汇报了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社会融入影响的回归结果。OLS回归结果和2SLS回归结果均表明，集中安置显著负向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这表明，相比于分散安置，集中安置不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社会融入程度		安置方式
	OLS 回归1	2SLS 回归2	2SLS第一阶段 回归3
安置方式	-4.688*** (1.429)	-14.532** (6.299)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搬迁时间	0.130* (0.057)	0.350* (0.143)	0.024*** (0.001)
年龄	0.067* (0.041)	0.059 (0.041)	0.001 (0.001)
性别	-0.222 (1.534)	-0.283 (1.603)	-0.023 (0.031)
健康状况	2.452** (0.991)	1.978** (0.987)	-0.005 (0.018)
文化水平	0.214 (0.168)	0.111 (0.176)	0.003 (0.003)
技术培训	0.404*** (0.150)	0.279* (0.148)	0.001 (0.002)
新建社会网络	0.038*** (0.011)	0.035*** (0.013)	0.001 (0.001)
原有社会网络	-0.006 (0.006)	-0.004 (0.006)	0.001 (0.001)
婚姻	-0.009 (1.233)	0.386 (1.281)	0.020 (0.023)
工作合同	1.980 (1.359)	1.680 (1.374)	-0.054*** (0.020)
家庭规模	1.127** (0.512)	1.846*** (0.535)	0.014** (0.008)
子女数量	0.458 (0.886)	0.093 (0.867)	-0.026** (0.012)
民族	1.082 (1.212)	1.124 (1.507)	-0.061** (0.026)
宗教信仰	1.753 (1.818)	1.206 (1.936)	0.027 (0.034)
人均纯收入	0.996* (0.519)	0.884* (0.511)	-0.013 (0.009)
发展型消费	2.836*** (0.480)	2.755*** (0.537)	-0.020** (0.008)
海拔高度			-0.006*** (0.001)
安置人口数量			0.014*** (0.005)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7.768 (6.559)	-3.515 (7.862)	0.408*** (0.129)
样本量	1231	1231	1231
R <sup>2</sup>	0.117	0.116	0.607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健康对于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健康意味着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其次，参加技术培训对于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新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具有积极作用。再次，原有社会网络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搬迁至新环境后原有社会网络在迁入地失灵，而迁入地新建社会网络对于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规模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融入，这是因为家庭规模增大意味着更多家人的陪伴，可以帮助缓解来自迁入地生存和工作方面的压力（熊景维和钟涨宝，2016）。最后，人均纯收入和发展型消费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邹一南，2021）。发展型消费作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生活水平的表征变量，其对社会融入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搬迁户自身生活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地促进社会融入。

与 OLS 回归结果相比，2SLS 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安置方式的回归系数其绝对值更大，表明内生性问题使得 OLS 回归低估了安置方式对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此外，由表 4 中 2SLS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海拔高度影响显著且系数为负，而安置人口数量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证明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均满足相关性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分析集中安置方式从哪些方面影响社会融入，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将安置方式对公

共事务参与、原居民互动、和睦相处、文化娱乐活动的回归方程进行联合估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5。似不相关回归整体检验结果表明，各方程随机扰动项之间“无同期相关”的检验结果  $p$  值为 0.000，故可在 1% 的水平上拒绝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原假设。因此，使用似不相关回归进行系统估计可以提高估计效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的好处是当回归方程等式右边解释变量的设定完全相同而只有被解释变量不同时，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直接比较。此外，使用功效系数法将社会融入测度指标体系中的 4 个指标的取值统一量纲为取值范围在 0~100 的分值，以便比较安置方式对 4 个指标的影响。

表 5 SUR 回归结果

变量	SUR 回归结果			
	公共事务参与 回归1	原居民互动 回归2	和睦相处 回归3	文化娱乐活动 回归4
安置方式	-12.477*** (3.481)	-4.166* (2.428)	-14.932*** (1.934)	-1.564*** (0.35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5.736*** (15.363)	18.579* (10.715)	101.504*** (8.451)	12.173*** (1.530)
样本量	1231	1231	1231	1231
R <sup>2</sup>	0.082	0.066	0.106	0.141

注：①控制变量与表 4 中相同，②\*\*\*、\* 分别表示在 1%、10% 的水平上显著，③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5 中 SUR 回归结果表明，集中安置显著降低了搬迁户的公共事务参与频率、与原居民接触频率、与原居民和睦相处程度以及文化娱乐活动支出占比。对比表 5 中回归 1 至回归 4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集中安置对公共事务参与及和睦相处的负向影响较大，对文化娱乐活动的影响最小。这一结果表明，集中安置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且主要表现在公共事务参与频率减少和与原居民和睦相处程度降低两个方面。

###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的重点民生工程，在多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具体做法可能存在地区间差异。本文以样本区域范围涉及的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等五大片区为例，讨论安置方式对于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变量	社会融入程度				
	武陵山片区 回归1	六盘山片区 回归2	秦巴山片区 回归3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回归4	乌蒙山片区 回归5
安置方式	-4.331** (2.480)	-12.739** (5.444)	-5.937* (2.333)	-13.172* (7.001)	-7.008* (4.16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3.876	44.205*	-11.698	94.149***	70.915***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

	(16.530)	(22.670)	(12.282)	(19.933)	(12.645)
样本量	290	154	337	250	200
R <sup>2</sup>	0.163	0.276	0.161	0.207	0.301

注：①控制变量与表4中相同，②\*\*\*、\*\*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③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6的回归结果可知，集中安置对于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表现在阻碍作用的程度差异上。从安置方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六盘山片区样本区域集中安置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较大，武陵山片区样本区域集中安置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较小。虽然基于不同片区分样本回归得到的安置方式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小有差异，但回归系数的符号始终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 五、机制验证

无论是描述性统计的数据支撑还是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都已证明集中安置会阻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为进一步考察安置方式如何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本文参考 Pagnini and Morgan (1990) 的做法，从社交距离的角度进行机制分析，并将社交距离按照物理距离、心理信任、公平感知三个维度加以定义。图2展示了安置方式影响社会融入的机制分析结果。本文参考 McHugh et al. (2018) 的做法，采用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对影响机制展开研究。相较于单路径中介效应分析，该方法可同时考虑多条路径的影响，在一个系统机制下计算每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并计算总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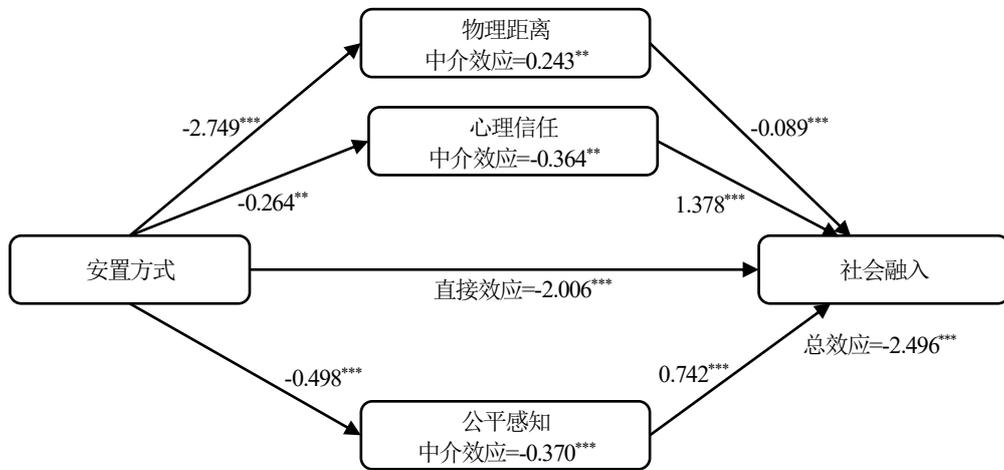


图2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安置方式通过物理距离、心理信任、公平感知三条路径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见表7）。具体来说，集中安置显著缩短了搬迁户与迁入地的物理距离，物理距离又显著负向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即集中安置通过缩短物理距离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此外，集中安置显著降低了搬迁户的心理信任，也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公平感知。而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均显著正向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因此，集中安置通过降低搬迁户的心理信任与公平感知，阻碍了搬迁户在迁入

地的社会融入。综上所述，安置方式通过改变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社交距离影响其社会融入，主要是集中安置显著降低了搬迁户的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程度越低，社交距离越大，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越低。虽然集中安置缩短了物理距离，但物理距离缩短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促进效应小于心理信任、公平感知降低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了搬迁人口的聚集可能引发搬迁户内部抱团取暖现象，增加搬迁户与原居民的社交距离。

表7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影响机制	系数	标准误	p值
从安置方式出发的路径			
安置方式→物理距离	-2.749	0.710	0.000
安置方式→心理信任	-0.264	0.109	0.015
安置方式→公平感知	-0.498	0.129	0.000
安置方式→社会融入	-2.006	0.737	0.007
通过社交距离影响社会融入的路径			
物理距离→社会融入	-0.089	0.026	0.001
心理信任→社会融入	1.378	0.173	0.000
公平感知→社会融入	0.742	0.150	0.000
中介路径			
安置方式→物理距离→社会融入	0.243	0.096	0.011
安置方式→心理信任→社会融入	-0.364	0.157	0.020
安置方式→公平感知→社会融入	-0.370	0.121	0.002
总效应	-2.496	0.768	0.001
样本量	1231	1231	1231

## 六、结论与启示

已有研究在分析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问题时，已经发现集中安置会导致搬迁户与原居民互动不足，而这不利于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发展，但现有文献主要基于 Gordon (1964) 的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加以分析并把其原因归结于文化差异。这不适用于以本县内就近安置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搬迁户社会融入问题的分析。同时，罕有研究从社交距离的角度考察集中安置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由此造成无法准确把握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进而不利于有效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发展。

有鉴于此，本文利用 2019 年中国 8 省（区）16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安置方式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与分散安置相比，集中安置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主要体现为搬迁户公共事务参与频率减少、与迁入地原居民和睦相处程度降低。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集中安置增加了搬迁户的社交距离，表现为搬迁户心理信任和公平感知降低，进而对其社会融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以集中安置为主的安置规划，往往减少了搬迁户与原居民的交往互动，很可能导致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不足。

本文对于加强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在中国移民搬迁问题方面的解释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社交距离的角度解释了即使在不存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集中安置也会阻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集中安置作为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安置措施，如何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后大量集中安置户顺利实现社会融入，是为防止脱贫户返贫所需重点关注的内容。但在现实中，集中安置所造成的社交距离的增加，对迁入地原居民与搬迁户间的互动造成了负向影响。这不利于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发展。鉴于此，本文从促进搬迁户社会融入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不仅要重视搬迁户收入保障，而且要加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社交互动。虽然让贫困户脱贫是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根本目标，但仅仅依靠就业扶贫、产业扶贫、政策兜底等方式并不能真正使搬迁户融入迁入地社会。与原居民建立并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关系，是搬迁户适应迁入地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果搬迁至新环境后处理不好与原居民的关系，集中安置户可能会出现内部抱团取暖并远离原居民的现象，从而难以融入迁入地社会环境，而分散安置户可能会被社会边缘化。这些都为搬迁户在迁入地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增进搬迁户与迁入地原居民的心理信任可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鉴于此，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社交互动：一是建设搬迁户与原居民良性互动平台，如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定期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等；还可以以公共服务为纽带，统筹社区公共建设和公共管理，将搬迁户与原居民联系起来。二是在安置区通过社区宣传、举办联谊活动等方式营造搬迁户与原居民互信互助的社会风气，推动构建搬迁户与原居民交往互动的和谐关系。

另一方面，全方位为搬迁户在迁入地营造公平和谐有序的生活环境。本文研究发现，公平感知程度的提高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积极影响。因此，要不断加强搬迁户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为搬迁户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同时，通过精神文明联创、服务难题联解、公益事业联办、生活环境联建、文化活动联谊的等共建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迁入地原居民与搬迁户的扞格，推动搬迁户与原居民互相尊重、和谐共处。

#### 参考文献

- 1.陈云松、张翼，2015：《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78-95页、第206-207页。
- 2.冯伟林、李树苗、李聪，2016：《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人口与经济》第1期，第98-107页。
- 3.冯晓英，2013：《香港新移民社会融入的经验与借鉴》，《人口与经济》第2期，第29-34页、第91页。
- 4.熊景维、钟涨宝，2016：《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第40-55页、第95-96页。
- 5.杨菊华，2009：《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1期，第17-29页。
- 6.张晨、马彪、仇焕广，2022：《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第56-75页。
- 7.周皓，2012：《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人口研究》第3期，第27-37页。
- 8.邹一南，2021：《农民工落户悖论与市民化政策转型》，《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第15-27页。

- 9.Akerlof, A., 1997,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ecision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66(5): 1005-1027.
- 10.Alba, D., and V. Nee, 2009,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1-153.
- 11.Anthias, F., 2007, "Ethnic Ties: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estion of Mobilizabil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4): 788-805.
- 12.Berry,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46(1): 5-34.
- 13.Boswell, E., 1986, "A Split Labor Market Analysi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Immigrants, 1850-188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3): 352-371.
- 14.Buchan, R., J. Johnson, and A. Croson, 2006, "Let's Get Personal: An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Distance on Other Regarding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0(3): 373-398.
- 15.Cheong, H., R. Edwards, H. Goulbourne, and J. Solomos, 2007, "Immigr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view",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7(1): 24-49.
- 16.Chiswick, U., 2009,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thnic Assimila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2(4): 24-49.
- 17.Danzer, M., and F. Yaman, 2013, "Do Ethnic Enclaves Impede Immigrants'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al Social-interaction Approach",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1(2): 311-325.
- 18.Duleep, O., and C. Regets, 1999, "Immigrants and Human-capital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186-191.
- 19.Esses, M., M. Jackson, and L. Armstrong, 1998,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Group Conflic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4(4): 699-724.
- 20.Facchini, G., E. Patacchini, and F. Steinhardt, 2015, "Migration, Friendship Ties,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2): 619-649.
- 21.Fernández, C., and C. Ortega, 2008, "Labor Market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in Spain: Employment at the Expense of Bad Job-matches?", *Spanish Economic Review*, 10(2): 83-107.
- 22.Fitzpatrick, P., 1966,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igest*, 1(1): 5-16.
- 23.Foment, C., 1989, "Political Practice and the Rise of an Ethnic Enclave: The Cuban American Case, 1959-1979", *Theory and Society*, 18(1): 47-81.
- 24.Fordham, S., 1996, *Blacked out: Dilemmas of Race, Identity, and Success at Capital Hig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7.
- 25.Gold, J., 1988, "Refugees and Small Business: The Case of Soviet Jews and Vietnames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4): 411-438.

- 26.Gordon, M.,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1-124.
- 27.Gould, V., 1999.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Group Solidarity: Evidence from a Feuding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3): 356-380.
- 28.Hoffman, E., K. McCabe, and L. Smith, 1996, "Social Distance and Other-regarding Behavior in Dictator Gam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 653-660.
- 29.Marger, N., 2001,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in Immigrant Adaptation: The Case of Canadian Business Immigrant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0(2): 169-170.
- 30.Massey, S., and P. Mullan, 1984, "Processes of Hispanic and Black Spatial Assimi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4): 836-873.
- 31.McHugh, J., J. Tang, B. Lawlor, A. Kenny, and F. Kee, 2018,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ctivitie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mong Older Irish Adults: Results from the Irish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eing", *Aging & Mental Health*, 22(1): 129-134.
- 32.Nee, V., and B. De Bary, 1973, *Longtime Californ':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58-67.
- 33.Pagnini, L., and P. Morgan, 1990, "Intermarriage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U.S. Immigran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2): 405-432.
- 34.Perez, L., 1986, "Immigrant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Family Organization: The Cuban Success Story Reexamin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 4-20.
- 35.Portes, A., and J. Sensenbrenner, 1993,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6): 1320-1350.
- 36.Portes, A., and M. Zhou, 1993,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 37.Qian, Z., and T. Lichter, 2007, "Social Boundaries and Marital Assimilation: Interpreting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Inter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1): 68-94.
- 38.Shaull, L., and H. Gramann, 1998, "The Effec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related and Nature-related Recreation among Hispanic American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0(1): 47-63.
- 39.Yamauchi, F., 2004, "Are Experience and Schooling Complementary? Evidence from Migrants' Assimilation in the Bangkok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4(2): 489-513.

(作者单位: <sup>1</sup>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up>2</sup>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sup>3</sup>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 王 藻)

## **Resettlement Types,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Relocate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in 16 Counties of 8 Provinces in China**

ZHANG Chen MA Biao QIU Huanguang

**Abstract:** The resettlement type of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soci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ocated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2019 micro survey data of relocate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in 16 counties of 8 province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settlement method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ocated poverty relief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de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has hindere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degre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the original residents in the immigration area. Furth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increases the social distance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reduction of psychological trust and fairness perception of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The follow-up support policies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should focu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good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the residents in resettlement areas, so as to create a multi-dimensional and fair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in resettlement areas and promote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the groups.

**Keywords:** Resettlement Type; Immigration and Relocation; Social Distance; Soci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alysis